

《十国春秋》欧阳炯生平考异

刘俊伟

欧阳炯是五代的一位词人,他的词主要收在《花间集》与《尊前集》中。在花间派诸词人当中,欧阳炯的词,不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看,成就都是比较高的;他的那篇《花间集序》更是在词学发展史上赫赫有名,被认为是词学批评之滥觞。因此,对于欧阳炯的生平,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下深入的考察。

可惜的是,关于欧阳炯的生平资料流传下来的很少,主要见于《宋史》、《十国春秋》及其他一些零星记载。《十国春秋》是清代的吴任臣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的基础上广采了五代、两宋时期的各种杂史、野史、地志、笔记、类书、文集编辑而成。无疑,对于欧阳炯的生平的记载,该书是最详细的。但《十国春秋》有一个关键性的错误,即它把欧阳炯分为欧阳迥(卷52后蜀五列传)和欧阳炯(卷56后蜀九列传)两个人物立传。

其中的“欧阳迥传”显然来自《宋史》卷479《西蜀世家》中欧阳炯的本传(连欧阳炯的“炯”字也同《宋史》一样写作“迥”字),不过《十国春秋》的口气更加客观一些,不似《宋史》那样带着明显的官修史书的特点。下面是二者之比较(文字下加点的为《宋史》有异文处,括号内为《十国春秋·欧阳迥传》的记载)。

欧阳迥,益州华阳人(成都华阳人)。父珏,通泉令。迥少

事王衍(前蜀后主),为中书舍人。后唐同光中,蜀平,随衍至洛阳(国亡降后唐),补秦州从事。知祥(高祖)镇成都(西川),迥复来入蜀。知祥僭号(及登极),以为中书舍人。广政十二年,拜(除)翰林学士。明年知贡举、判太常寺。迁礼部侍郎,领陵州刺史,转吏部侍郎,加承旨。二十四年,拜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同)平章事、监修国史。尝拟白居易讽谏诗五十篇以献,昶(后主)手诏嘉美,赉以银器、锦彩。

从昶(后主)归朝(宋),为右散骑常侍,俄充翰林学士,就转左散骑常侍。岭南(南汉)平,议遣迥祭南海,迥闻之称病不出。太祖(宋太祖)怒,罢其职,以本官分司西京。开宝四年,卒,年七十六。赠工部尚书。

迥性坦率,(未成年少)无检操,雅善长笛。太祖(宋太祖)常召于偏殿,令奏数曲。御史中丞刘温叟闻之,叩殿门求见,谏曰:“禁署之职,典司诰命,不可作伶人之事。”上(太祖)曰:“朕尝(常)闻孟昶君臣溺于声乐,迥至宰司尚习此技,故为我所擒。所以召迥,欲验言者之不诬也。”温叟谢曰:“愚臣不识陛下鉴戒之微旨。”自是不复召。

迥好为歌诗,虽多而不工,掌诰命亦非所长。但在蜀(成都)日,卿相以奢靡相尚(争尚奢靡),迥犹能守俭素(独俭素自守),此其可称也(人颇以此多之)。

《十国春秋》中的欧阳炯传主要来自一些野史、杂记、文集等其他对欧阳炯的记载。下面是它的记载。

欧阳炯,蜀人。事高祖、后主,历官武德军判官、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炯善文章,尤工诗辞。唐张素卿常绘《十二真人像》,世称其妙;安思谦得素卿本,乃于明庆节上献后主,命炯为之赞,装潢成帙,其见重多此类也。

炯著有《武信军衙记》、《花间集序》传世,序曰……。文,故广政三年作也。

又小辞十七章,人亦时时称道之,《渔夫歌》尤为辞家所倡和。

虽然历来的学者都认为欧阳迥(迥)和欧阳炯(炯)当为一传,即欧阳炯传,但都未说明缘由,或话焉不详,比如夏承焘先生在《唐宋词人年谱》之《韦端己年谱》中提出的理由是:“按炯作花间集序在蜀广政三年,当即花间结集之年。花间称炯曰舍人。据《宋史》四九七,迥为中书舍人在蜀明德元年,即花间结集前之六年,至花间结集后八年,方拜翰林学士,则迥即炯无疑矣。”^①夏先生的意思是说,欧阳炯(炯)传中提到的他作《花间集序》的时间也是《花间集》结集的时间是广政三年(940),《花间集》中称他为欧阳舍人;而欧阳迥(迥)传中记载在明德元年(934)至广政十二年(949)之间他正担任中书舍人,由此推定二人实为一人无疑。先不说从一条证据就断定二人为一人是否有力,单从推定本身来看也仍值得商榷,因为欧阳炯(炯)传中也提到他曾担任中书舍人,而且未说明具体年代,这就存在着他在广政三年也担任中书舍人的可能。其实证明二人实为一人的材料很多:首先,二人的本传中有很多的相同之处,如都是蜀人,都事后蜀高祖、后主,都担任过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都好诗词;其次,宋人勾延庆的《锦里耆旧传》和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记与欧阳迥(迥)传大体相同,而作“欧阳炯”;最后,欧阳炯(炯)传中提到的安思谦献张素卿《十二真人像》欧阳炯题赞事,《益州名画录》载这件事称炯时为翰林学士兼礼部侍郎,与欧阳迥(迥)传之记载相合,《益州名画录》还记载了炯作《八卦殿壁画奇异记》一事,时炯为翰林学士,这与欧阳迥(迥)传之记载也相合。那么一个欧阳炯(迥)传如何变成了欧阳迥与欧阳炯两传呢?我认为主要是传写失误所致,以《十国春秋》为例,其《欧阳迥传》主要源于元代脱脱《宋史》卷479《西蜀世家·欧阳迥传》,而宋代洪遵《翰院群书》之《学士年表》,明代柯维骥《宋史新编》皆作“迥”,《宋会要·职官》作“迥”,即“迥”之俗体,可见“迥”当为“迥”传写之误;其《欧阳炯传》主要源于《花间集》宋刻本和宋代黄休复《益州名画录》,二者皆

作“炯”，可见“炯”当为“炯”传写之误。本文为论述方便皆从“炯”。

综上所述，欧阳迥(迥)和欧阳炯(炯)当为一传确实无疑。

应该说，除了以上的错误外，《十国春秋》对于欧阳炯的生平的记载还是颇为严谨的。比如，《益州名画录》卷上载：“甲寅岁十一月十一日，值蜀主诞生之辰，安公进素卿所画《十二仙真形》十二帧，蜀主耽玩欲赏者久，因命翰林学士、礼部侍郎欧阳炯次第赞之。”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和张兴武著的《五代十国文学编年》沿用此说^②。然查《九国志》、《资治通鉴》皆云安思谦(即《益州名画录》中所称“安公”)于广政十七年二月见杀，《十国春秋》因之；《新五代史》所记不详，大体在广政十一年之后，十七年之前；而《历代年表》则作广政十二年。综上所述，安思谦最迟于广政十七年二月见杀。而甲寅虽即广政十七年，明庆节乃十一月十一日(后蜀在广政元年定十一月十一日后主诞生之日为明庆节)，此时思谦已死，如何献之？然《益州名画录》的作者黄休复乃宋人，其言当可信，且李昉《益州名画录》序云：“黄氏……取其目所击者五十八人，品以四格，离为三卷，命曰《益州名画录》。”卷上亦云：“乾德三年，圣朝克复，吏部侍郎吕公余庆镇蜀日，求古书画图书众将进呈，斯画(指张素卿所画十二真人像)预焉。”很显然黄休复见过原画。盖画乃安思谦于昔时蜀主诞辰所献，蜀主“耽玩欣赏者久”，乃于甲寅年命欧阳炯赞之，而黄休复见画之赞而误以为就是甲寅年所献。吴任臣可能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所以他在收载此事时没有提到它的年代；与之相对照的是，关于欧阳炯与作《花间集序》的时间，吴任臣却明确采用了序中提到的年代。

除了本传，《十国春秋》中另外一些人的传记中也有关于欧阳炯的零星记载。比如卷47前蜀十三列传《僧贯休传》记载了欧阳炯作《贯休应梦罗汉画歌》(一作《禅月大师歌》)一事，卷56后蜀九列传《景焕传》记载了欧阳炯作《应天寺壁天王歌》一事，卷57后蜀十列传《僧可朋传》记载他与僧可朋交往事，卷56后蜀九列传《黄筌

传》记载他作《蜀八卦殿壁画奇异记》一事等。其中欧阳炯作《贯休应梦罗汉画歌》和《应天寺壁天王歌》一事在《益州名画录》和《野人闲话》中都有记载^③,但颇多疑点。《贯休应梦罗汉画歌》中的贯休,字德隐,俗姓姜氏。婺州兰溪人。能诗善书妙画。王氏建国时,来居蜀中龙华之精舍。曾绘罗汉一十六身,并一佛二大士像,皆作古野之貌,不类人间。或曰梦中所睹,觉后图之,谓之“应梦罗汉”。欧阳炯之《贯休应梦罗汉画歌》即为之而作,因贯休又称禅月大师,故又名《禅月大师歌》。《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和《五代十国文学编年》^④以歌中有云“休公休公始自江南来入秦,于今到蜀无交亲”推知作歌时贯休尚存。贯休卒于前蜀高祖永平二年十二月,这一年欧阳炯只有十七岁,两书又由此推知此歌作于是年或稍前。且不说这个推论是否合理,仅仅从常识上判断一个十七岁甚至更小的少年能写出如此精到的诗简直是不可能的;此外,如果作歌时贯休尚且健在,根据诗中内容看来,欧阳炯与贯休关系并不一般,当为忘年之交,二人友谊且不要追溯到欧阳炯十七岁之前?更何况贯休在其众多的诗歌中对欧阳炯只字未提。事实上,《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和《五代十国文学编年》中作为证据的《野人闲话》并未明确表明欧阳炯曾经见过贯休。《野人闲话》中云:“(应梦罗汉画)门人昙域、昙弗等,甚秘重之。蜀主曾宣入内。叹其笔迹狂逸,供养经月,却令分付院中。翰林学士欧阳炯亦曾观之,赠以歌曰……”从上下文来看,为门人所秘重,又被蜀主宣入内,供养经月,分付院中的应当是那幅笔迹狂逸的应梦罗汉画。古代对物品也可称供养。分付院中的院当指翰林院,而欧阳炯也当过翰林学士。不过那是在孟蜀朝(后蜀后主孟昶广政十二年),那么这个蜀主当指孟昶,这与他喜欢书画的习惯也很符合;更主要的是欧阳炯当时已五十四岁,完全可能写出这首诗。另外《宣和画谱》卷三中云:“贯休间为本教像,唯罗汉最著。伪蜀主取其本纳之宫中,设香灯崇奉者逾月,乃付翰林苑大学士欧阳炯作歌以称之。”正可与此相映证。而《唐五代文学编年史》

云《野人闲话》称欧阳炯为翰林学士是借用,《宣和画谱》是转述增益之误,未免牵强附会。

另一首《应天寺壁天王歌》情况与之类似。《野人闲话》中云:“唐僖宗皇帝翠华西幸之年,有会稽山处士孙位随驾止蜀。位有道术,兼攻书画,皆妙得笔精。曾于应天寺门左壁上画天王一座,部从鬼神。奇怪斯存,笔势狂纵,莫之与京。三十余年无有敌者。景焕其先亦专书画,尝与翰林欧阳学士炯乃忘形之交。一日连骑同游兹寺,偶画右壁天王以对之。渤海在旁(在旁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观其逸势,复书歌行一篇以纪之。续有草书僧梦龟后至。又请书之于上廊壁上。故书画歌行,一日而就。倾城人看,阆咽寺中,成都之人。故号为‘应天三绝’”。《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以唐僖宗幸蜀在广明元年(880)至中和五年(885),由上引文云“三十余年”,歌云“未滿三十载”下推三十年为开平四年(910)至贞明元年(915)^⑤。但是与欧阳炯作的《贯休应梦罗汉画歌》一样,这一首《应天寺壁天王歌》既被称为三绝之一,也很难想象是出自一位最大二十岁的少年之手。另外景焕的年龄也很成问题,按《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的说法,他活到宋太宗雍熙间(984—987)。就算他那时有九十岁,他在公元915年也仅仅二十岁,在这样的年纪能够画出与孙位媲美的画来,也是很可怀疑的。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把引文中“景焕其先”解释为“景焕的父亲”而非一般解释的“景焕最初的时候”,并且从诗中一句“匡山处士名称朴”推定景焕的父亲名景朴。但是《益州名画录》卷上逸格中却称“景朴者,蜀人也,蜀广政年辄于应天寺门西畔画《西方天王及部从》两部,以对孙遇笔。”而《全唐诗》、《全五代诗》在收录这首诗时也皆题《题景焕画应天寺壁天王歌》^⑥。《十国春秋》则云景焕、景朴实为一人。从诗画的成熟考虑到二人的年龄及各书的记载,我认为诗画当作于广政年间,至于所谓三十年可能为误传,毕竟最早记录此事的《野人闲话》一书没有流传下来,而该书本也多载奇异之事^⑦,自然有杜撰之处。

综上所述,《十国春秋》虽然在有关欧阳炯生平的记载方面还有一些错误,但从总体上说,它不失为研究欧阳炯生平的关键著作。

注:

①见《夏承焘集》第一册《唐宋词人年谱》第18页

②见《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五代卷”第471至472页,《五代十国文学编年》第294页

③见《益州名画录》卷上和《太平广记》卷214引《野人闲话》之《贯休》与《应天三绝》条。

④见《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五代卷110页,《五代十国文学编年》140页

⑤见《唐五代文学编年史》147页

⑥见《全唐诗》下册1889页,《全五代诗》第九册卷58第882页

⑦见《说郛》卷17录《野人闲话序》云:“野人者,成都景焕,山野之人也。闲话者,知音会语,话前蜀孟氏一朝人间闻见之事也。其中有功臣瑞应,朝廷规制可纪之事,则尽自史官一代之书,此则不述。故事件繁杂,言语猥俗,亦可警悟于人者。”

参考书目:

1.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中华书局1982年版。

2.引得编纂处编:《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中华书局1987年版。

3.方积六、吴冬秀编:《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92年版。

4.(宋)欧阳修撰,(宋)徐无党注:《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

5.(元)脱脱撰:《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

6.(宋)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

7.(宋)李焘撰,(清)黄以周辑补:《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8.(明)冯琦原编,(明)陈邦瞻纂集,(明)张溥论正:《宋史纪事本末》,中华

书局1955年版。

- 9.(明)柯维骐撰:《宋史新编》,明嘉靖刊本。
- 10.(清)吴任臣撰:《十国春秋》,中华书局1983年版。
- 11.(宋)路振撰:《九国志》,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
- 12.(宋)无名氏辑:《五国故事》,学海类编丛书。
- 13.(宋)洪遵编:《翰苑群书》之《学士年表》,知不足斋丛书。
- 14.(宋)句延庆撰:《锦里耆旧传》,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
- 15.(宋)张唐英撰:《蜀祷机》,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
- 16.(宋)黄休复撰:《益州名画录》,画史丛书本,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
- 17.(宋)无名氏撰:《宣和画谱》,画史丛书本,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
- 18.(后蜀)赵崇祚辑:《花间集》,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递修公文纸印本,校以北京图书馆藏宋绍兴十八年建康郡斋刻本,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 19.(清)曹寅主修:《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 20.(清)李调元编:《全五代诗》,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
- 21.夏承焘著:《夏承焘集》,浙江教育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 22.傅璇琮主编,傅璇琮、贾晋华著:《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
- 23.张兴武著:《五代十国文学编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大学中文系